

李贺诗歌 渊源及影响研究

LIHE SHIGE YUANYUAN JI YINGXIANG YANGJIU

李德辉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李贺诗歌 渊源及影响研究

LIHE SHIGE YUANYUAN JI YINGXIANG YANGJIU

李德辉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贺诗歌渊源及影响研究 / 李德辉著. — 南京 :
凤凰出版社, 2010. 11
ISBN 978-7-5506-0015-7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李贺 (790~816) — 唐
诗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13919号

书 名 李贺诗歌渊源及影响研究

著 者 李德辉

责任编辑 李相东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 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

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 546 号 邮编:210031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75

字 数 245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015-7

定 价 30.00 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25—58849828)

目 录

引 言 / 1

第一章 李贺诗歌渊源研究(上) / 17

- 第一节 长吉体的内涵与特色 / 19
- 第二节 李贺的病变与文变 / 37
- 第三节 李贺的汉代情结 / 47
- 第四节 李贺鬼神诗的历史成因 / 60

第二章 李贺诗歌渊源研究(中) / 69

- 第一节 李贺与楚辞 / 71
- 第二节 李贺与汉魏六朝乐府 / 89
- 第三节 李贺与南朝宫体 / 106
- 第四节 李贺与汉唐野史小说、游仙诗及其他 / 118

第三章 李贺诗歌渊源研究(下) / 127

- 第一节 李贺与鲍照 / 129
- 第二节 李贺与谢灵运、庾肩吾、庾信 / 137
- 第三节 李贺与李白、杜甫 / 144
- 第四节 李贺与他的交游群体 / 152

第四章 李贺诗歌影响研究(上) / 161

第一节 晚唐五代的李贺接受 / 163

第二节 两宋时期的李贺接受 / 191

第三节 金元时期的李贺接受 / 224

第五章 李贺诗歌影响研究(下) / 241

第一节 明代的李贺接受 / 243

第二节 清及近代的李贺接受 / 267

第三节 《唐诗三百首》为什么未选李贺诗 / 290

结 语 / 299

后 记 / 304

，誉称“诗鬼”，明初《平定县志》卷一《艺文志》载：“李贺，字长吉，唐宗室之后，世居福昌（今河南洛阳）。”《平定县志》卷一《艺文志》载：“李贺，字长吉，唐宗室之后，世居福昌（今河南洛阳）。”《平定县志》卷一《艺文志》载：“李贺，字长吉，唐宗室之后，世居福昌（今河南洛阳）。”

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，是唐代诗人李贺诗歌的文学渊源和接受简史。就个人命运而言，李贺确实是很不幸的，虽然他文才卓异、诗名早著，却官职卑冷、未成大器，襟抱未开即衔恨而终，负有异才而不入大道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典型的高才薄命者之一。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，世称唐诗“三李”，而以李贺成名最早、享年最短，给人们留下的遗憾也最大。

而从文学角度来看，他又是非常幸运的：作为杰出诗人，他所创作的诗篇万代流传，为他树立了不朽的声名，让他在肉体的生命消亡之后，继续在艺术上延续着生命的不朽。不仅他的诗歌充满魅力，他那独特的创作方式、超常的艺术思维、怪异的长相与性格，千百年来也是人们关注和谈论的话题。他诗人薄命、才子多夭的不幸，以及去世后升天为仙、玉楼掌记的传说也吸引了后人，增添了人们对他的研究兴趣，历年发表的数量可观的论文与著作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李贺研究的魅力与价值，也正体现在这些地方。

一、李贺的特点

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异才，李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，是他的出名之早与才华之高。王维、李白、韩愈等多数大诗人成名成家，都

是在中青年以后,李贺则还是一名十多岁少年的时候即远近驰誉,不到二十七岁即魂归紫极。《唐摭言》卷一〇更说他年仅七岁即“以长短之制,名动京华”^①,排除此说的夸张失实成分^②,也可见他的天分之高、出名之早、轰动之大。即使不取《唐摭言》的小说家之谈,把此诗当作李贺十八九岁时的作品,也不妨碍这个结论的成立。十八九岁的李贺,已经有相当一批优秀作品了,其文学风格已经趋于稳定了。以这么轻的年龄,就有了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和社会知名度,这在唐诗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。李白算是才华盖代的诗人了,可他二十五岁时才出蜀,这个时候的他,还根本谈不上什么名气和影响。杜甫更是迟至三十五岁还在读书和壮游,二十五六岁才开始有象样一点的诗,今存杜集中的第一首诗《游龙门奉先寺》即写成于他二十四岁之时。据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一所引宋人黄鹤的注释及《杜诗详注·杜工部年谱》,《游龙门奉先寺》一诗作于开元二

① 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一〇“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”条,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,第1669页。

② 《唐摭言》的这一记载,属唐代小说家的夸饰之言,不足信,清代黄之隽等人对此已有论次。但《新唐书》的撰写者宋祁对此却不加鉴别,径直采入卷二〇三《文艺传下》,称赞“七岁能辞章,韩愈、皇甫湜始闻未信,过其家,使贺赋诗,援笔辄就如素构,自目曰《高轩过》,二人大惊,自是有名”。这一段史文所述的事实很不可靠,他却写得有根有叶,不仅沿袭误说,还误导后人。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总结明清以来诸家之说,指出贞元十二年(796)李贺七岁之时,韩愈未为员外(正从董晋在汴州幕府为观察推官),皇甫湜也尚未及第。两人都在外地,无缘到东都与韩愈“连骑造门”请见李贺。至《高轩过》诗题下小序所载的在东都为都官员外郎,则已是元和四年(809)之事,时李贺在十九、二十岁之间,韩愈四十四岁,皇甫湜为陆浑尉。参见黄之隽《詹言》卷五,吴企明《李贺资料汇编》,中华书局1994年版,第297页;洪兴祖《韩子年谱》,徐敏霞校辑《韩愈年谱》,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48—50页。清冯浩《樊南文集详注》引《高轩过》中“庞眉书客感秋蓬,谁知死草生华风,我今垂翅附鸿冥”三句,指出据此即知“其非七岁(作)明矣”,所举内证有一定说服力。详见刘学锴、余恕诚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》,中华书局2002年版,第2271页。

十四年(736)后杜甫游东都之时,此时的杜甫,年龄正在二十四岁左右^①,虽然正当大有可为之时,却仍是毫无名气。而李贺在这个年龄,却已经历尽了文学的辉煌,生命都快要走到尽头了^②。若拿二十四五岁时的李白、杜甫和李贺相比,若真像李商隐所说的那样“贺生二十四年而卒”^③,则李贺毕生当无一诗,然而他却写出了那么多的名篇佳作,可与杜诗同传不朽^④。张籍、王建和李贺同为中唐乐府名家,然唐人称籍“业文三十春”,其乐府方“举代少其伦”^⑤,称王建则为“白头王建”^⑥,是两人之诗皆至垂老方工,李贺则二十多岁即工,这些都足以说明他的卓绝不群。依照常理,诗人之所以伟大,除了个人才华等主观因素以外,生活阅历也是要起到一定作用的,王国维所说的类似李后主那样的“眼界始大、感慨遂深”^⑦,是需

① 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,中华书局1979年版,正文第1页,前面所附《杜工部年谱》第12页。

② 这是根据杜牧《李贺集序》“贺生二十七年”的说法来讲的,实际上,李贺的享年并未达到二十七,杜《序》所谓二十七年是虚岁。关于这一点,周尚义先生有详细的考证,其说甚确,见周尚义《李贺歌诗论考》,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。若以李商隐《李贺小传》李贺生二十四年而卒的说法,则更能显示李贺之卓绝。关于李贺的年寿,旧有两说:一为二十四岁,源于李商隐《李贺小传》“长吉生二十四年”,《旧唐书·李贺传》承之;一为二十七岁,源于杜牧《李贺集序》“贺生二十七年死矣”之载,《新唐书·李贺传》承之,今人多取此说。

③ 刘学锴、余恕诚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》,中华书局2002年版,第2265页。

④ 这一点,最早为清人纳兰性德揭出。其《书昌谷集后》云,据吕汲公(大防)《杜少陵年谱》,杜甫的第一首诗《冬日洛城谒老子庙》作于其三十岁时,“盖晚成者也。李长吉未及三十,已应玉楼之召,若比少陵,则毕生无一诗矣。然破锦囊中,石破天惊,卒与少陵同寿千百年,大名之垂,彭殇一也。优昙之华,刹那一现;露椿之树,八百岁为春秋,岂计修短哉!”所说极为有见,详见吴企明《李贺资料汇编》,中华书局1994年版,第265页。

⑤ 《白居易集》卷一《读张籍古乐府》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2页。

⑥ 彭定求《全唐诗》卷三八六张籍《赠王建》,中华书局1960年版,第4360页。

⑦ 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,《蕙风词话·人间词话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,第107页。

要很多后天条件的,再伟大的诗人,其文学创作进入精深华妙的境界,也要到中老年阶段。但是这个规律到了李贺那里就不适用了,他既不像李白那样踏遍大江南北,名高天下,也不像杜甫那样饱经忧患,诗思如潮,更没有李商隐那样的辗转戎幕、寄人篱下的经历。既不像王维和大历十才子那样出入于公卿之门,混迹于上层社会,也不像韩愈、元稹、白居易、刘禹锡那样宦海浮沉,周旋江海,更没有一般的唐代举子、进士、选人那样在京城和外地广泛游历的经历。他的生活面是那么狭窄,到过的地方是那么少,经历是那么简单,仅仅是靠着向内心要诗,可照样也写出了那么多的惊人之制,这就更值得注意了。试想,一个人仅仅是凭着才华和秉性的卓异,在现实生活没有提供充分条件的情况下,尚且达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,倘若天副以年,引入正道,讲求章法,各种主客观条件都基本具备,那么其创作水平和文学成就将达到什么程度,还真的难以预料。也许正是就这个意义上,杜牧才说李贺本来是有可能“奴仆命骚”的。从他的来势看,他的创造力似乎还未达到巅峰状态。人们甚至很难预测,他如果真的活到五六十岁,将来的创作可能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。怪才异才何代无之,何处无之,但像李贺这样的才子却是不可重复的。宋元以来,想追踪模仿李贺的年轻人何止千百,但就没有看到有谁达到了李贺这样的高度,真使人难解、使人着迷。这一现象,倘若从李贺成长的大的社会环境出发,或许也能寻求到一二答案。借用陈寅恪、吕思勉等老一辈学者的相关论断,或许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解释^①,但是

① 2000年春,笔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读到《民国丛书》版王桐龄《中国民族史》时,就产生了这样的模糊认识。其时,见到王氏该著列出的唐代内徙各周边少数民族多达数十种,通过杂居、通婚、收养、改姓、接受语言文化、改变服饰等方式与中原人民融合,民族大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,最终形成新汉族。这个新汉族最大的特点是创造力旺盛,富有活力,故能自强于民族之林。书中提出汉族“善于蜕变”,崇尚中庸,“无种族界限”,对外族“无歧视之见”,故在诸文明古国中,惟独中国文化能绵延发展,至今不衰。笔者对于该著描述的上述情况和作者的上述见解(转下页)

时间一久,又总觉得这样的解释总显得说服力不够,都不足以解释李贺。李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,诗篇是那样奇诡,他生命的长度和诗歌的高度构成了强烈的反差,这种差异,本身就是一个奇迹,是不可解释、没有答案的。没有答案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。

李贺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,他还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、充满争议的人物。他七岁的时候,就有当场赋《高轩过》诗的离奇传说,充分展现出秉性的卓异。旧题冯贽《云仙杂记》中还有“李贺唾地者三,成文三篇”^①的神奇传说,宛然一个文学神童。唐朝是个多出神童、追捧神童的朝代,其时成名的神童,多是些在文学上一鸣惊人的少年才子。但早熟的果子往往凋落也最早,唯有李贺等极少数人将出众的才名一直保持到了生命的尽头,算是个例外,此亦可

(接上页)十分惊讶,倍觉新鲜。后来又了解到陈寅恪先生在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提出,“种族与文化”为理解晋唐时期历史和文化之关键观点(参见陈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,唐振常《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〉学习笔记》,第5—8页),又闻鲁迅先生有“唐人大大有胡气”之论,吕思勉先生在《两晋南北朝史·总论》中也提出,在隋唐之时,“民族之异同,顾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”(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,第1页)。将种种前贤论述综合起来,因有这种看法,言下之意,认为李贺是唐代民族大融合的美好结晶、唐代新汉族在文学方面的优秀代表,他那样的人主要孕育于唐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中。唐以后,这种社会环境没有再现,历史上也就不会再有李贺了。

① 按李贺“唾地成文”之说,见《云仙散录》引《文笔襟喉》:“有人谒李贺,但见其久而不言,唾地者三,俄而文成三篇。”(中华书局1998年版,第65页)《云仙散录》一书及其所引《文笔襟喉》之文皆宋人伪作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〇“子部·小说家类”对此有很好的考辨。然而反过来想,这一离奇记载的出现,本身就是能够反映社会现象、具有社会认识意义的。作者之所以把李贺的才能写得近于妖异,不也正好反证了李贺作为杰出诗人在宋以后世人心目中的“集体印象”,印证了他诗思的敏捷、文笔的奇秀、举止的古怪和性情的怪异吗?所以,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,伪材料用得好的,也会变成“与真材料同一可贵”的东西,要在读者如何对待。参见陈寅恪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〉上册审查报告》一文对史料真伪问题的论述,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,第248页。

见其聪颖过人。他的这些卓绝表现,博得过很多少年才俊、畸人异士的喜爱与赞美,可就在同时,也受到过几乎同样多的来自不同人群的诋毁,可谓集毁誉于一身。不满他的人,或云理不及骚,或云未造平淡,或云牛鬼蛇神,或云无补多欲,甚至贬为迷惑人心的诗妖,差异之大,史所罕见。

李贺成名及去世以后,又有牛鬼蛇神、石破天惊、呕心沥血等传说传世,后来还演为成语。这些评语所反映的精神品质,也不是常人所能具备的。唐宋以来,民间还长期流传着他生前以诗为业、奚囊随身,死后玉楼赴召、为天帝作新宫词的神异传说。这些更是除李白以外的任何唐代诗人所无的,而且也比关于李白的种种传说更加神奇。由于有这些传说附丽,李贺就更显异祥和另类了。

二、李贺接受史的三个重点及本书的研究目标

若就诗人接受史的角度言之,其为人所注目的,则在以下三个方面:

一是依靠丰富想象力铸成的奇诡文辞和冷艳风格。其文集中,类似“雨工骑入秋潭水”(《神弦曲》)、“绿粉扫天愁露湿”(《梁台古意》)等奇语^①,比比皆是,色彩冷艳,构思怪奇,运用起来却相当老成。相对于正道直行的汉魏初盛唐诗歌来说,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审美形态,是诗人偏执性情、内向性格的反映,更是诗人着意追求创新、“笔补造化”的结果。

二是奇奇怪怪的鬼神世界,以及弥漫在诗中的幽凄气氛和苦闷意味。作为李唐宗室的后裔,李贺一向自视甚高,理想远大,但家境贫寒,到处碰壁,因此产生了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。身体的

^① 本书所引李贺诗,均据王琦《李长吉歌诗汇解》,《李贺诗歌集注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,下不再注。

病痛和命途的多舛,时时折磨着他,一方面使得他对社会缺乏认识,耽于幻想;另一方面则使他的诗作融入浓郁的感伤意味,形成幽僻怪异的个性特征,着重对主体心灵的开掘和虚幻意象的构造,其诗多不可解,如同山精木魅、怨月啼花,“不可以理求,不可以气求”^①。因此前人对他就有了“牛鬼蛇神”的评价。

三是集中在他身上的许多奇异而矛盾的地方。长相奇丑,却才气奇高。身为男儿,心灵却格外的细腻敏感。是那样的瘦弱多病,在诗中却显得那么的铁血和刚强,每每以壮士自许。身为一个唐人,思想却常停留在古代。作为一个北方人,思绪却常飞落到南方,诗思不落在西南的巴蜀,就在正南的潇湘,要么就是江南的水乡。生活在车水马龙的两京官道边上,却对熙来攘往的人流置若罔闻,尽想些荒古玄妙之事。本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,却年方二十即头飘白发,内心枯槁,忧生畏死。客京三年,贫居闹市,却罕见交友,而总把自己关在家中暗室里静想心事。人们在他的诗作里看不到都市的繁华,只看到泛着冷光的都城十二门、风雨交加的崇义里、衰兰送客的咸阳道、行人稀少的都市外。赁居洛阳数年,却视洛中繁华如无物,而老是往荒山野岭古坟上跑。性格是那么的自傲自大,却又是那样的自卑自残,容不得别人对他些许的鄙视。遣词造句是那么怪异,那么喜爱使用颜色词和冷硬词,那么喜欢写阴暗变态的东西,有时却又毫不吝惜地飞香走红,目不暇接。诗写得那么好,成诗的方式却是那么的怪:白天骑驴出游觅句,晚上回家成诗,苦熬到深夜仍不休息,真正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。那么不懂官场的规则,对文学却是那么痴迷。思想虽不深刻,诗人气质却异常浓厚。生为唐人,诗体却显得那么高古,既不类唐体,也不像六朝乐府,即使是近体诗,遣词、语气也多古味。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很有知名度,在历代诗话、文话及笔记小说中出现的频率

① 施补华《岷佣说诗》,王夫之等《清诗话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,第989页。

是那样的高,在历代文学选本中露面的机会却是那么的少,还不及很多名气在他之下的诗人。做的诗是那么有特色,却也是那样的不典正,以致不能入选普及率高、知名度大的文学选本……上面所述,没有一个方面不离奇古怪、充满矛盾,充满趣点。人们总是尝试着去解释它,可解释却又总是显得苍白无力,这又从反面印证了李贺研究的魅力所在。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上面许许多多的不一致,才使得他成为文学史上的绝无仅有,不仅为唐代所仅见,就是求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,也是极为罕见的。

这就是李贺,一个才子、病夫和臆想狂的复合体,一个念念不忘皇孙身份、终日做着贵公子的梦的人,一个诗魔缠身的人,一个才华出众却又未成大器的充满遗憾的人,一个集众多矛盾于一身的人。正是由于有上述矛盾复杂的现象存在,才使得李贺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“这一个”,才能吸引历代那么多关注的目光,才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。如果有人要问李贺诗歌文学渊源和接受研究的意义何在,那上面的阐述已经做了最好的回答。

上面所述,涵盖三个层面:现实人生的,传说的,文学的,都很奇特,可称李贺“三奇”,“三奇”居一即可不朽,何况有三!何况都表现得如此突出!以病苦沉沦之身世,负世间稀有之奇才,其所制作,无论当时和后人如何模仿,都无法得其仿佛,无怪乎无论世之治乱,他都是文人关注的对象、膜拜的典型。

李贺作诗虽然强调独创,但决不意味着他排斥借鉴,恰恰相反,他的诗是有着广泛的继承与借鉴的,其诗歌来源广泛、成分复杂,需要细研诗集,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。做好此事,不仅有助于其作品内容的深入理解和旨意的准确把握,纠正文学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说法,对于他的接受史研究也将是大有裨益的。

根据上述考虑,我为本书设定了这样两个目标:一是较为全面、深入地清理李贺诗的文学渊源,弄清李贺诗歌创作都受到过哪

些因素的影响,这些影响在他的创作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;二是较为全面、清晰、准确地勾勒和描述李贺诗歌研究史的概貌,探索唐宋以后各代的李贺研究都提出了哪些问题、解决了哪些问题,各个时期产生过哪些有贡献的学者和著作,其成就得失如何,各个时期的研究风气如何,这些风气又反映了什么^①。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,来总结历代李贺接受的特点与规律,探讨相关问题的得失,并做适当的理论阐释。

虽然唐宋明清代代相承,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化,各代世风、士风、诗风的差异性还是很显著的,故朝代仍是李贺接受史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。据此,本书将唐五代视为李贺接受史上的初始期,宋金元为发展期,明代为深入期,清代和近代为总结期,按此序列展开论述。

三、研究前史与材料叙说

本书据以研究的资料,分为两大部分:

第一部分是历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评论,多数取自吴企明先生编纂的《李贺资料汇编》,此书凡 31.6 万字,中华书局 1994 年出版,辑集了自唐至近代的李贺研究资料,取材极广,鉴辨细致,校录认真,注意区分史料层次,材料来源交代具体,给笔者以极大的

^① 按,本书关于李贺诗歌渊源的思考,曾受到陈允吉、吴海勇《李贺诗选评》一书的较大启发。陈允吉先生在该书第一部分《乡恋、病态和贵公子的梦》的“导论”部分明确指出,李贺殊少留意儒术,道书和佛典却成了他的精神养料。此外,他还“酷嗜《楚辞》、乐府、六朝小说、游仙诗和宫体艳词,因此他很早就开始耽于非非之想,重视心灵体验而疏于与人交往”。笔者读后深受启发,因此本书前半部分几个章节的设计又做了相应调整。详见陈允吉、吴海勇《李贺诗选评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,第 2 页。本书后半部分对李贺接受史中上述问题的设置,则参考了傅璇琮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基本问题的学术构想。详见傅璇琮《孙映逵〈唐才子传校注〉序》,《学林清话》,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,第 25 页。

帮助,在此谨对他深表感谢!然此书问世较早,搜寻李贺资料略有遗漏,新近面世的成果也未采入,故笔者在此书之外,也做了不少新的资料发掘与辑集工作,另辑了近三万字的研究资料作为补充。作为二十一世纪的研究成果,笔者遵循当今的学术规范,尽可能多地参考借鉴了前人、近人、今人的研究成果,并对所有确曾参考过他人成果的地方逐一加写说明,以示尊重。这样做,既加深了自己对李贺其人其诗的理解,纠正了以往对李贺认识上的一些浮泛与偏差,也集思广益,促进了研究的深入。

为审慎起见,本书在文献征引上,出自吴书的,一般都并未直接照录,而是依其所提供的线索,找到原文校对准确,注意选择较好的版本录文;找不到原书的,方据此书引用。又将书中部分时代晚近的资料更换成时代较早的文献,部分文字则抽换了讹误更少的底本。是为说明。

第二部分是李贺诗歌的校勘笺释和艺术评论,以王琦《李长吉歌诗汇解》为主,适当结合宋人吴正子、刘辰翁,明人曾益,清人陈本礼、姚文燮、方扶南,近人钱锺书和今人刘衍、陈允吉的研究成果。其中古代部分,受吴正子、刘辰翁、曾益、王琦的启发最多,现代则以钱锺书和刘衍、陈允吉三家的帮助最大。吴、刘、曾三位既是古代诗人又是优秀学者,其解李贺既融会学识又灌注诗心,多有创获。王琦不愧为乾嘉学者,其注释李诗皆严谨有据,不为空言,不作臆断,持论谨慎,学风踏实,值得信赖。钱先生学养精深,多年潜心集部之学,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对李贺诗做了十分出色的研究,其《谈艺录》中的李贺研究成果较多,见解极精,至今仍为海内外学界所信重,本书亦多所参阅。湖南师范大学刘衍先生,是新时期较早开展李贺研究、对李贺诗的各个方面都真正下过苦功的少数学者之一,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。所撰《李贺研究丛稿》、《李贺诗校笺证异》、《李贺年谱新笺》等著作,就李贺的生平及创作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有价值的意见,弄清了不少疑难点,较为科学

和准确地把握住了李贺诗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,在李贺诗篇的笺释、版本的搜讨、文集的校勘方面用力尤深、贡献尤著,最应参考^①。此三书原来分刊,不易见到,2008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收入《刘衍论著集》,公开面世,方便笔者。复旦大学教授陈允吉先生潜心研究李贺诗歌,时间长达数十年,发表学术论文多篇,皆颇有分量,解决了李贺生平事迹、文学创作研究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,对于李诗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尤其精辟,论述中灌注了较强的创新意识,具体论证又皆言之有据、新颖合理,其中有不少值得重视的好见解。且处处严守学术规范,尊重他人劳动成果,征引资料广泛,论著作者遍及大陆、港台、欧美、日本,堪称近年来李贺研究的典范。他与吴海勇合编的《李贺诗选》虽然只是一个唐诗选本,却内容充实,论述精粹,启发性强,其价值并不下于一本学术专著。离开了这些前人的著述,笔者的研究同样寸步难行,故在此一并表出,以示尊重。其他参考过的有影响的文学史、批评史、唐诗选和唐诗鉴赏辞典还有不少,皆随文注明,以示渊源有自,这里就不一一交代,正文后面也不再另编参考文献了,读者识之。

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,学界探讨李贺诗歌艺术渊源的论文渐多。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曹毓英《李贺学习楚辞和古乐府的艺术成就》(《华中师院学报》1978年第2期)、许可权《李贺与民歌》(《河南文艺》1978年第6期)、吴企明《论杜甫和李贺》(《杜甫研究学刊》1996年第3期)、《长吉诗艺术渊源论》(《文学遗产》1997年第6期)、杜承仪《李白李贺艺术比较论》(《古籍研究》1988年第1期)、房日晰《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》(《文学遗产》1993年第2期)等。曹毓英的文章认为李贺从楚辞和汉魏六朝乐府中汲取了不少养料,变化创新,运用乐府古题反映现实生活,丰富并发展了乐府诗的创作领域。许可权的文章从内容体裁、表现手法、语言等方面

^① 《刘衍论著集》第一卷,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,第42页。

论述了古代民歌对李贺诗的影响。吴企明在文章中提出李贺学杜有三个方面:一,篇名学杜,“即事名篇”;二,部分诗的语言造意取自杜诗;三,某些诗篇的构思章法意境取自杜诗。杜承仪的文章认为,李白与李贺都继承发展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艺术传统,这是他们相同的特征。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自我表现力,李白尤为突出。但他们在艺术风格上又截然不同,李白的诗清雄豪放,李贺则虚荒诞幻,这在意境、气势、构思和语言上都能看出。房日晰的文章认为,杜甫对李贺的影响,不在其诗对李贺的某些启示,也不在个别词句的脱胎或承袭,而在于杜诗浓郁的浪漫主义色调,这个影响对李贺诗带有根本的性质。张宗福《论李贺对〈楚辞〉的接受》(《西华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5期)指出,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,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、相似的现实语境,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,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,与此同时,还与韩孟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。陈敬胜《李贺对屈原诗艺的传承与超越》(《邵阳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5期)指出,屈原的楚辞对李贺有深远的影响,这同李贺与屈原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和遭遇有关。李贺对屈原的楚辞艺术既有传承,又有超越。这体现在诗歌形象、诗歌语言、修辞和结构等几个方面。王天觉《论李贺“神弦”诗对汉魏六朝〈神弦歌〉的继承与发展》(《乐山师范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10期)谈到,李贺“神弦”系列诗歌写得神意森索,极富特色。同汉魏六朝的《神弦歌》在描写对象和内在结构上都有所继承,在诗歌句式、情调氛围和性质用途上又有新的突破。黄桂凤《李贺在杜诗接受史上的特殊地位》(《玉林师范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2期)论及,李贺诗歌接受了杜诗的比兴手法,诗意较为隐晦,在杜诗接受史上占有特殊地位。龚慧兰《试论李贺女性诗歌的审美特色——与宫体诗相比较》(《绥化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4期)指出,女性在李贺诗中数量丰富,所写女性类型也呈现多样性。200多首诗中,有80多首直接间接写到了女性,关于娼妓的诗就多达